

不平等和社会反抗之间联系紧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当一个社会发生叛乱或反叛时，其中必然存在普遍的可觉察的不平等感，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意识到下面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即对不平等这个概念本身及其晦暗不明的内容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发生反叛的可能性。——阿马蒂亚·森



【印】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美】詹姆斯·福斯特 (James Foster) 著
(增订版)

王利文 于占杰 译

ON ECONOMIC INEQUALITY
论经济不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论经济不平等

(增订版)

ON ECONOMIC INEQUALITY

【印】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美】詹姆斯·福斯特 (James Foster) 著

王利文 于占杰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经济不平等 / (印) 森 (Sen, A.) 著; 王利文, 于占杰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0-21658-4

I. ①论… II. ①森…②王…③于… III. ①平等 (经济学) —研分 IV. ①F0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3239 号

论经济不平等 (增订版)

[印] 阿马蒂亚·森 著

[美] 詹姆斯·福斯特

王利文 于占杰 译

Lun Jingji Bupingd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mm×235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6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1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致爱女安塔拉和南达娜

愿希望长伴。
当你们长大成人，
就会发现，
无论怎样丈量，
希望都会少那么一点点。

增订版序言

该书的第一版以 25 年前（1972 年）我在沃威克大学的讲座内容为基础，可以看作是对最近发展起来的经济不平等的技术性文献的一个贡献，同时也尝试将那部文献与关注现实层面的不平等这样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尽管该书的大部分是分析性的和数学性的论证，但所用到的定理和给出的结论是用直观方式表述的。本书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形式化结论的重要性最终不仅取决于其与规范的交流的相关性，还取决于其与人们所争论的和所捍卫的事情的相关性。

在此增订版中，所增加的附录（25 年后再论经济不平等）文字颇多（篇幅几乎与第一版相埒），写作初衷一仍其旧。在过去的 25 年里，在公开的辩论和争论中，不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心问题（也更有争议）。与此同时，评价和测度经济不平等的纯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献开始大量出现，且方兴未艾（这些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往往不易看懂、从而令人生畏）。第一版中的已被部分检验的分析性问题在此版中得到了强化或扩充，同时，新版中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并加以探讨。

增订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为了检验和测度关于不平等和贫穷问题的研究性结论。我与合作者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共同完成这项任务。福斯特是一个理想的合作者，不仅因为他理想的工作技能以及我们脾性相投，还因为他对相关文献的掌握程度。事实上，福斯特本人最近在关于评价和测度不平等和贫穷的理论

进展方面贡献甚多。

在附录的写作过程中，由于这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是对过去的 25 年关于不平等这个主题的进一步探讨，里面涉及诸多调查报告和结论，我和福斯特不得不对这些调查报告和结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进行考量。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分析性结论的实质，而不是技术细节。对那些兴趣在于更严格的技术过程的读者，我们提供了本书的参考文献，以方便读者就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的一般意义进行查询确认。我们还将对本书所隐含的主要技术性问题以某种可行的方式予以详尽阐述。

1972 年的雷德克里夫讲座受由社会选择理论发展起来的形式推理的影响很大，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①我那时——至今仍然——沉浸在这一领域中。该书第一版中的分析用到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选择视角”。^②1973 年出版的《论经济不平等》及笔者其他著作中，我已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应将社会选择理论更为直接地用到政策评价及公众争论和社会批判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文献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以来大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 1973 年版的书所希望的方向）。^③附录对这些探索和研究结果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其不平等和贫穷的评估及测度的内容进行了检验。

最初的增订内容经萨德赫·阿南德 (Sudhir Anand)、托尼·阿特金

① K.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Wiley, New York, 1951). 阿特金森运用与此不同的思路进行的不平等测度的著作对我 1972 年的雷德克里夫讲座影响甚大。约翰·海萨尼 (John Harsanyi)、瑟奇·科尔姆 (Serge Kolm)、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和帕特里克·萨佩斯 (Patrick Suppes) 对社会正义的探讨也对该讲座产生了影响。

② 在许多方面，《论经济不平等》是我早期著作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Holden-Day, San Francisco, 1970; republished, North-Holland, Amsterdam, 1979) 的续篇。

③ 对于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选择理论领域的技术性文献的报道和批评性文献，See “Social Choice Theory” in K. J. Arrow and M. Intriligator (eds.), *Handbook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North-Holland, Amsterdam, 1986); See also K. Suzumura, *Rational Choice, Collective Decisions and Social Wel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3)。

森和托尼·肖罗克斯 (Tony Shorrocks) 阅后, 在修改稿中吸收了他们极为有益的评论和建议。这些年来, 与下面诸君的交流使我获益匪浅, 他们是: 肯尼斯·阿罗、法布瑞兹·巴卡 (Fabrizio Barca)、考希克·巴苏 (Kaushik Basu)、查尔斯·布莱克比 (Charles Blackorby)、安德里·勃兰多利尼 (Andrea Brandolini)、萨特亚·查卡莱瓦蒂 (Satya Chakravarty)、弗兰克·考埃尔 (Frank Cowell)、科恩 (G. A. Cohen)、帕热·达斯格普塔、安格斯·迪顿 (Angus Deaton)、戴维·唐纳森 (David Donaldson)、让·德热兹 (Jean Drèze)、巴斯科·达塔 (Bhaskar Dutta)、罗纳德·德沃金 (Ronald Dworkin)、加里·菲尔茨 (Gary Fields)、彼得·哈蒙德、伍尔夫·盖特纳 (Wulf Gaertner)、娜娜克·卡克瓦尼 (Nanak Kakwani)、拉维·坎伯 (Ravi Kanbur)、彼得·兰伯特 (Peter Lambert)、约翰·缪尔鲍尔、罗伯特·诺齐克 (Robert Nozick)、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西蒂克·奥斯马尼 (Siddiq Osmani)、帕雷桑塔·帕塔奈克 (Prasanta Pattanaik)、德里克·帕菲特 (Derek Parfit)、道格拉斯·雷 (Douglas Rae)、马丁·拉瓦利昂 (Martin Ravallion)、约翰·罗尔斯、拉马詹德兰 (V. K. Ramachandran)、约翰·罗默 (John Roemer)、托马斯·斯坎伦 (Thomas Scanlon)、戴维·斯塔雷特、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holas Stern)、铃村兴太郎 (K. Suzumura)、拉里·特姆金 (Larry Temkin)、菲利普·范巴里斯 (Philippe Van Parijs)、约翰·韦马克 (John Weymark)、佩顿·扬 (Peyton Young) 和斯蒂芬诺·萨马尼 (Stefano Zamagni), 等等。我和詹姆斯·福斯特在此感谢他们的帮助。詹姆斯·福斯特对伊里妮·拉吉·福斯特 (Irene Raj Foster) 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同样, 我也要对她表示感谢。阿兰·亚伯拉罕 (Arun Abraham) 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我们感谢他。

感谢麦克阿瑟基金会对本书附录中提到的研究的支持。此外, 我还要感谢伦敦经济学院三得利—丰田经济学与相关学科国际研究中心 (STICERD) 和意大利银行, 当我访问这些地方时为我提供的研究上的

便利条件。

该书第一版中的内容在增订版中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甚至以前的页码也尽可能保持原貌（以方便查阅参考）。新增的内容——“25年后再论经济不平等”由我和詹姆斯·福斯特合著。

阿马蒂亚·森

1996年9月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第一版序言

不平等思想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一方面，它是所有思想中最简单的一个，与其他思想相比，它更容易使人们获得一个不假思索的直观印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以至对该概念任何一种阐述都是极有争议的。^① 因此，“不平等”成为众多哲学家、统计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研究主题。尽管本书仅关注经济不平等，但字里行间仍反映出这种既简单又复杂的二重性。我不得不引用相当多的技术概念并使用一些数学运算，但这些概念都用非技术性的术语进行了解释，并且其数学结果也给出了直观的解释。这样做是希望非专业读者不致因其过于专业化而望而却步。形式化结论的重要性最终不仅取决于其与规范的交流的相关性，还取决于其与人们所争论的和所捍卫的事情的相关性。

尽管本书的技术性内容和非技术性内容没有放到不同的章节分述，但对于技术性内容不感兴趣者仍可跳过（或略过）其技术形式阐述的内容，而直接进入定理的直观陈述和结论的直观解释。读者可通过节标题辨别哪些是技术性较强的章节。

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是我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中研究的许多思想的发展。^② 我尝试着将那

^① See Bernard Williams,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P. Laslett and W. G. Runcima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cond Series, Blackwell, Oxford.

^② Holden-Day, San Francisco, 1970, and Oliver & Boyd, Edinburgh, 1971, *Mathematical Economics Texts*, No. 5.

部著作里提出的思想框架应用到经济不平等这个特定领域。那时我拒绝使用社会评价方法，现在我更强烈地拒绝；在那部著作中我所捍卫的内容，在这本书中，尤其是在关于不平等这个主题的内容中，我会论述得更加充分。

我要感激许多人。在准备雷德克里夫讲座 (Radcliffe Lecture) 时，我正在与帕热·达斯格普塔 (Patha Dasgupta) 和戴维·斯塔雷特 (David Starret) 合作撰写一篇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测度的论文。^① 我感激他们，不仅是因为我把我们合作论文中的内容 (特别是定理 3.1 和定理 3.2) 纳入讲稿中，还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且我非常自如地运用了这些知识。

雷德克里夫讲座 (去年 5 月进行的) 内容是非形式化的，在其后的讨论中我获益匪浅。这里要特别提到戴维·爱泼斯坦 (David Epstein)、约翰·缪尔鲍尔 (John Muellbauer)、格雷厄姆·派亚特 (Graham Pyatt) 和约翰·威廉森 (John Williamson) 诸君，感谢他们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将这些讲座稿修订成书的过程中，我扩充了一些章节，不仅增加了由于时间所限或表述形式所限 (在讲座中加脚注难免使听众生厌) 而不能放到讲座中的内容，还增加了一些其他内容，这些内容包括：1972 年 1 月在埃塞克斯大学 (Essex University) 经济系研讨会的讲座；1972 年 3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哲学系的联合研讨会的讲座；1972 年 3 月在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1972 年 8 月在德里经济学院的特别讲座和 1972 年 8 月在印度统计学院研讨会的演讲。我要感谢托尼·阿特金森 (Tony Atkinson)、普拉纳布·巴德翰 (Pranab Bardhan)、尼基尔丝·巴塔查亚 (Nikhils Bhattacharya)、桑吉特·鲍斯 (Sanjit Bose)、特伦斯·戈尔曼 (Terence Gorman)、彼得·哈蒙德 (Peter Hammond) 和理查德·雷亚德 (Richard Layard)，感谢他们有益

^① “Notes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3 (1973).

的评论和批评。由于篇幅所限，要感谢的许多人恕不一一罗列。

若不是赛莉娅·特纳 (Celia Turner) 和露芭·马弗德 (Luba Mumford) 令人称奇的熟练的打字方式代替我极不熟练的打字方式，本书不可能完成，我非常感激她们。

最后我还要感激沃威克大学 (University of Warwick)，特别要感谢格雷厄姆·派亚特教授，感谢他今年邀请我做雷德克里夫讲座。

阿马蒂亚·森

1972年11月于伦敦经济学院

目 录

I 论经济不平等

第 1 章 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与平等	3
第 2 章 不平等的测度	24
第 3 章 作为拟序的不平等	45
第 4 章 工作、需求和 not 平等	72

II 25 年后再论经济不平等

A. 1 回顾和动机	103
A. 2 不平等与福利	117
A. 3 福利函数：一致性与占优	123
A. 4 相对不平等：测度方法与拟序	130
A. 5 分合性与一致性	139
A. 6 不平等与收入贫困	152
A. 7 评估域、能力与不平等	178
参考文献	201
人名索引	232

论经济不平等

第 1 章 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与平等

“我觉得，人类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德尔菲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①，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754年6月12日，让-雅克·卢梭在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的序言中如是写道。虽然这篇论文并没有使他获得第戎科学院的奖章（而他早期的较少反叛意味的论文却于1750年获得了这一奖项^②），但它包含的思想催生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要求。

不平等和社会反抗之间的联系确实十分紧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当一个社会发生叛乱或反叛时，其中必然存在普遍的可觉察的不平等感，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意识到下面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即对不平等这个概念本身及其晦暗不明的内容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发生反叛的可能性。雅典的“智者”们在讨论平等问题时将奴隶排除在外，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做，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随着历史的演进，“平等”和“正义”这两个概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级分化及阶级间的社会

① 我们或许还记得德尔菲神庙碑铭深刻而严肃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② 指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一文。——译者注

隔阂也变得越来越不为社会所容忍，不平等这一概念本身也因此发生了
2 重大变化。

在这几次讲座中，我仅关注经济不平等，并且将其限定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域中。^① 但是，我仍要申明的是：当我们进行目前经济学家们所认同的经济不平等分析的时候，不应忘记不平等概念的内容的历史演进。我们对这一主题的各种看法的相关性将最终取决于这些看法与我们当下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焦点的关联程度。

客观性特征与规范性特征

尽管我将探讨一些政策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政策问题，但这几次讲座的主要关注点仍为分配不平等的总体测度问题。在测度不平等的问题上，我们宜以方法论的要点开始。经济学文献中提到的不平等的测度方法有两大类。其一是，以某种客观的意义来描述不平等的内容，通常是对相关收入变量进行统计上的分析测量。^② 其二是，从社会福利某种规范的概论出发，提出测度不平等的指标，这样，在给定的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不平等程度越高就表示社会福利水平越低。^③ 我们或许会认为采用前者更为有利，于是我们就可区分出“看到的”不平等与从伦理的角度进行“评价的”不平等。在第二种方法中，不平等不再是一个客观概念，其测度问题也容易滑向道德评价。

3 这一方法论的要点实际上反映了不平等概念的两方面内容。很明显，一方面，不平等这一概念包含了客观的因素；从直观上看，两个人平分蛋糕显然比一个人得到整个蛋糕而另一个人一块也分不到更为平

① 特别是，我将主要关注收入分配而不是直接关注财富。

② 常用的度量方法包括方差、变差系数、洛伦兹曲线的基尼系数及其他公式，这些将在本书第2章讨论。

③ 关于测度收入分配的规范性方法的实例，可参见多尔顿 (Dalton, 1920)、查姆普诺瓦 (Champnowne, 1952)、艾格纳和海因斯 (Aigner and Heins, 1967)、阿特金森 (1970a)、丁伯根 (Tinbergen, 1970) 和贝塞尔 (Bentzel, 1970)。

等。另一方面，当面临一大群人如何分配收入这样的复杂问题时，就很难用一种完全客观的方式来描述不平等，如果不考虑伦理的概念，就无法恒量不平等水平。

究竟应当采用哪一类度量方法？这个问题并不易回答。从实际运用情况来看，这两类方法并非全然相异相离。即使我们将不平等视为一个客观的概念，在测度时也必定会涉及规范性问题；在比较几种不同的不平等客观测度方法时，也确实需要有规范性方面的考量。同时，即使我们从规范的角度去测量收入不平等，也未必意味着我们要对整体进行伦理评价。我们很可能只是针对规范性比较的某个方面，而究竟是哪方面内容则取决于不平等问题的客观特征。比如说 x 比 y 的不平等程度要低，即使这是一个规范性陈述，也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地建议选择 x 而不是 y ，而是应结合其他方面的考量（如那些包含了总收入特征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特征）而做出一个全面的判断。^① 无论如何，对不平等进行测度都必须同时考虑其客观特征与规范特征。

量度类型

方法论中的另一个问题是确定量度类型，因为各种不同的量度都可能被用到。最严格的量度类型是定比量度（ratio-scale），如重量和高度等。根据这种量度，我们可以说物体甲的重量是物体乙的 2 倍（无论我们用千克还是用磅作单位来测量）。比定比量度的要求稍微宽松些的量度是定距量度（interval-scale）。在这种量度下，测量值本身之比率是没有意义的，但测量度之差的比率是有意义的。例如，无论是用摄氏度数还是华氏度数来表示， 100°C 与 90°C 之差都是 90°C 与 85°C 之差的 2 倍（如果用华氏度数表示，则这三个值分别为 212°F 、 194°F 和 185°F ），但温度值之间的比率却因所选用单位的不同而不同。

^① 从森（1976b）对价值判断的分类看，对不平等的判断是一个非强迫性的评价判断。